

編者按

今期「百年中國與世界」一欄中刊載的文章，有兩篇都涉及早期蘇聯和中國的關係。楊奎松利用近年來大量披露的前蘇聯檔案文獻，細緻地整理出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對中共從建黨初期至抗日戰爭間的財政援助情況，顯示莫斯科援助的規模和力度，是中共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此篇文章的刪節本已刊於六月號印刷本中，而今期網絡版則刊登全文的上半部。李嘉谷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政府為了爭取北京政府支持，在1919和1920年兩次對華宣言中，都宣布廢除沙俄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但一旦蘇俄新政權穩固、國際環境改善，便拋棄承諾，承襲沙俄侵華、損害中國主權的種種做法，中東鐵路和外蒙古獨立問題，都是有力的例子。

吳鵬森和佘君的文章結合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前後歷史過程以及當時的國家發展戰略，重新考察了目前理論界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動因的不同理論觀點，認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根本原因並非源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也不是當時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配套產物，而是中國共產黨有於傳統社會主義理念對農村經濟社會制度的一種主觀選擇。

近代西方文化不斷輸入中國，學術界普遍以西學為參照，對傳統學術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西方史學家大多以「西方挑戰、中國應戰」的模式來理解中國面對西方的策略。但是，牛秋實認為這個模式並不能說明中國內在文化和學術的變化，因為中國文化並非被動地接受西方思想，她反而是有選擇地按照自己的傳統習慣加工和轉化自身的文化，並以戰勝西方為目的。他的文章收錄在「人文天地」一欄。此外，該欄另有曾子炳反思詩歌精神的文章。作者指出90年代以來，詩歌淪落為一種藝術的門類，詩人為追求詩歌的邊緣化，刻意令詩與生活保持距離。於是，人們的精神處境每況愈

下，「喪失了自然的神性和大地的感覺」。可是，作者相信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完善自我的過程，詩歌的精神可以體現個人對大我的追求。這是擺脫全球虛無主義的一個出路。張英進的文章則選擇了六部二十世紀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分析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衝突的體現。

2001年，浙江省長興縣教委率先推行「教育券」制度。在「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中，申欣旺撰文剖析這宗有關教育投資的重要改革。作者認為「教育券」的制度能有效地解決現有基礎教育投資體制存在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政府並應鼓勵民營教育基金的成立，讓民間興辦基礎教育。這樣，國家可以通過壯大民辦教育，改革基礎教育投資體制，以提高基礎教育的效益和質量。

改革開放以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斷加強，地方官員兼任企業要職的現象屢見不鮮。這種現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些官員被稱為「紅頂商人」。由於地方政府既是經濟發展的利益主體，也有能力干預地方市場和企業，紅頂商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令市場出現不公平競爭，甚至使地方保護主義抬頭。楊光飛指出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需要亦步亦趨，否則這股因「政企不分」而出現的反市場力量便難以消除。文章同樣收入「經濟、社會與傳媒」一欄。

余世存在「景觀」一欄中的文章，生動解讀六四後知識份子失語情況下民眾心理和流行文化現象。楊振寧教授紀念愛因斯坦誕辰一百二十五年的演講稿，則深入淺出地評介愛因斯坦對二十世紀物理學的決定性貢獻以及對二十一世紀的影響。